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周玉良主持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

“九五”规划

国家级重点课题

中国地方

教育史研究

主 编 李定开

副主编 吴洪成

重庆教育史

第一卷

本卷作者 吴洪成

周玉良主持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国家级重点课题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

重庆教育史

第一卷

主 编 李定开

副主编 吴洪成

本卷作者 吴洪成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编委会

(均以姓氏笔画为序)

名誉顾问	何东昌	邹时炎	杨海波	陶西平
顾问	王炳照	田正平	江 铭	郭福昌
	潘懋元			
主 编	周玉良			
副主 编	汤世雄	宋恩荣		
编 委	王日新	王豫生	方 骏	冯象钦
	齐红深	刘文璞	安效珍	李才栋
	李定开	杨进发	张凤民	张 彬
	陈乃林	陈光华	金汉杰	赵宝琪
	姜树卿	高 志	阎国华	符康荣
	傅九大	蒙荫昭	蔡寿福	熊贤君

《重庆教育史》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欧可平

副 主 任 蒋国昌

委 员 欧可平

宋乃庆

周富道

张学敏

名 誉 主 编 蒋国昌

编辑室主任 孙文松

主 编 李定开

副 主 编 吴洪成

本 卷 作 者 吴洪成

彭智勇

蒋国昌

胡 斌

李定开

李跃文

彭智勇

陈流汀

彭智勇

孟小军

吴洪成

宋乃庆

陈流汀

孙文松

唐智松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序

在这世纪更迭、千年转换的历史性时刻，我们奉献出自己的研究成果——《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国家级重点项目。本项研究是由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牵头，在中央及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大力支持下进行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采用统一规划，按行政组织力量开展的大规模的、系统的关于地方教育史的研究。这一研究的开展，是中国教育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过去的100年里，中国教育史作为一门学科，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初创到发展、兴盛的历程。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清除极“左”思潮干扰，端正学科研究方向，系统搜集、整理、积累资料，拓宽研究领域，深入开展专题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这有力地推动了教育史学科的建设，使中国教育史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科学体系，成为教育科学领域里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一门学科。

从以往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成果来看，关于古代教育史的描述，多为汉族聚居、文化发达的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历代居于政治中心地带的教育状况。近现代教育史研究则较为注重京、沪、宁与东南一带新教育产生的地区。这种侧重，自然有其合理因素，因为这些地区一般来说代表了当时全国教育发展的水平与主流。但是，过去对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忽视其他地区，特别是边远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以及各民族教育交流融合的历史，因此不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如实地反映整个中国教育史的全貌。开展中国地方教育研究的目的就在于试图弥补这一不足。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是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延伸与加强,而不是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简单诠释或地区性缩微,应有新的发掘,新的创造。研究地方教育史,需对中国教育史的总体发展脉络有宏观上的把握,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充分地展现出各地区教育发展的历史全过程和历史特点、地域特色。其研究的对象、范畴与方法,与中国教育史研究相比,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相异之处。它既要反映中国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共性,更要揭示地方教育发展的特殊性与个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地方特色是地方教育史的生命。紧紧抓住“地方”二字是这一研究的关键。

地方教育史是研究教育现象的空间与时间组合的学问。从广义上讲,它应归属于地域文化的研究范畴,是介于教育学与地理学、历史学之间的交叉学科。研究地方教育史,自然会涉及各地教育发生、发展与本地区自然环境、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自然环境、生态环境会影响到人类的生存状态,进而对人们教育的模式、程度、内容与方法等,对民俗、民风,对人的气质、性格、品味、情趣的形或以及人才的数量与分布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关于这些,我国的古籍中早有所记载。自然环境同时也影响着一方的文化艺术、宗教信仰、民居建筑,这些又都是教育的外部条件,间接地影响着地方教育的发展。至于人文环境、社会结构对教育的影响,应当说更为直接,更为广泛。诸如区域历史文化变迁中经济的升沉消长、政治的争斗沿革、文化的滋生变异、民族的纷争融合、人口的增减流动、战争的起伏动荡等等,可以成为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与制约条件,影响着教育的方针、内容与方法。同时学派与学术思想的地域性分布,更是直接作用于教育。如北宋、南宋时期的关学、洛学、濂学、闽学、婺学、陆学、湖湘学等都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点。这些学派的相对集中与士人设学授徒传播教化,直接影响着当地的教育走向及其特点。

地方教育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认为,地域文化

的区域划分,可分为“机能文化区”与“形式文化区”。前者以行政区划中心的主导与协调功能为标志。后者以“具有某种文化特征或某种特殊人群的地域分布”,以历史文化的功能为标志。从历史的视角看,以上两种空间的组合各成体系。对于一些地区来说,两种文化区的划分、归属互不对应,而在另一些地区,则又呈现为长期稳定的重合。

根据对各省区发现的7 000多处新石器文化遗址以及其后种种历史资料的考察,可以证明在公元前6 000年至公元前2 000年间的文明曙光时期,中华民族的祖先在分散聚居的各个地区,已分别创造了各具特色的多元性区域文化。如以渭、汾、洛中原地区为中心的黄河中游文化区;以泰山为中心的黄河下游文化区;以太湖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下游文化区,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中游文化区,以及辽东、辽西、燕山地区的燕辽文化区,鄱阳湖——珠江三角洲的华南文化区,黄河上游的甘青文化区、北方游牧与渔猎文化区等等。而且这些不同区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或迁播扩大,或分化重组,又演变成新的文化区域。如后来的三秦文化区、齐鲁文化区、中州文化区、荆楚文化区、三晋文化区、燕赵文化区、关东文化区、吴越文化区、徽州文化区、巴蜀文化区、滇云文化区、黔贵文化区、八桂文化区、八闽文化区、岭南文化区、陇右文化区、草原文化区等等。不同区域、不同民族间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不断地相互摩擦、交流、渗透、吸收、融合,逐渐形或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总格局。这种演变又直接影响到相互间的交通、人口迁徙,逐渐形成了长期相对稳定的行政区划。我们现在讨论的地方教育史,是以现行的行政区划为范围的。今天的行政区划是由历史上的行政区划与相对稳定的文化系统演变而或,虽不完全对应于古代的历史文化区域,但文化的承袭与曾经所属的历史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我们追寻地方教育的历史轨迹所不能忽视的。

中国历史上,由于战争避难、军队戍边、政治变乱、自然灾害等种种原因,曾经出现过多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和民族迁徙。这些都对文化的交流重组,教育的兴衰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例如从东汉末年到两宋之际,游牧民族入据中原,先后形成三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大批中原人民的南迁,在给南方带来大量劳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与中原文化。除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外还有历代因罪而被贬谪的官员士人的零星流放迁移。他们中有许多谙习儒家经典的人才,南来之后无论著书立说,还是教学授徒,都深刻地影响着当地的教育与文化习俗。如三国时代,会稽大儒虞翻因直言获罪,被贬交州(含今广东、广西)。但他“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又如柳宗元“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又迁为柳州刺史。他雄心不减,兴建州学与孔庙,重振文教事业,不仅对湖南教育、广西教育,而且对其他地区的教育产生了一定影响。从近代来看,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战火燃遍大半个中国,迫使中国教育大规模西迁。使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蒙受了巨大的破坏,延缓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众多文化精英在短期内迅速地向西南地区、而北地区聚集,形成了战时内地文化教育中心。既将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新思想、丰厚的人文精神充盈到这块偏僻的土地,又为战后教育与文化的复兴保存了民族的命脉。这些在抗战时湖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的教育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近年来地方志、地方教育志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发掘地方教育史的资料,对各地教育发展的历史加以科学地梳理与分析,实事求是地记述地方教育发展的史实,客观地分析与总结其特点与规律。通过研究,在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下,充分展现中华民族历史上教育发展的丰富而多样的全貌。通过这一研究,为当前的教育改革与未来的教育发展提供决策的科学依据。

地方教育史研究是在多年来地方教育志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它以地方教育为研究对象,既要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记述史实,还需揭示历史本质,分析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评论利弊得失,作出价值判断。与地方教育志研究相比,地方教育史研究更多地体现出研究者的主体性因素。这就要求研究者既要更加坚定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同时也要注意借鉴实证史学的方法,注重证据实证,重视逻辑,讲究严谨求实的学风。并要不断地加强对新知识、新方法的学习、借鉴与运用。只有这样,才可能追随学术的前沿,阐发历史的精义,提供历史的借鉴。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是在世纪转换与千年更迭之际立项、开题、研究、完成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试图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体现出时代的精神。

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每个时代历史学的研究,都会深深地刻上时代的印记。历史科学的认识过程与人们的社会实践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社会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时代精神都会在历史认识的观点、视野、视角、方法等方面得到及时的敏锐的反映。经历了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的中国史学界,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进展。对许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作出了一些新的澄清、新的结论、新的认识、新的评判。过去那种一元论的思维方式已得到很大改观,那种以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爱国与卖国等简单化、表层化的评判方式,那种以政治标准代替学术标准的治学模式,已逐渐被人们舍弃。当新的史料不断被发现,日渐丰富充实;当中国越来越快地、越来越大幅度地走入世界,社会环境与社会心理都日渐发生变化;当旧时代结束新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应当以一种更为宽广的胸襟,去开拓更加广阔的学术视野,用更为客观、开放、包容的态度,更加高屋建瓴地来审视历史。我们紧紧追随时代前进的脚步,努力在地方教育史的原野上开辟出一片片新的绿洲,结出累累

果实。我们相信,通过展现地方教育史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将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全貌与总体的认识。同时,对那些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者的论调,也是一种有力的批判。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的开展,会对人们认识教育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提供一些新的思考与借鉴。

一部部各具地方特色的地方教育史研究成果的相继出版,为整个中国教育史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内容。使我们认识到,若忽视对地方教育史的研究,中国教育史发展过程的记述与发展规律的总结就是不完备的。中华民族教育的发展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统一整体。这个统一的整体,正是通过各具地方特色与民族特色的地方教育,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形成的。以全国教育的共同性、普遍性为参照系探寻地方教育的特殊性、多样性与不平衡性;通过地方教育的特殊性、多样性、不平衡性来进一步研究全国教育的共同性、普遍性。二者间的相互比较与印证,将有助于更加科学、全面、深入、准确地总结中国教育发展的规律以及经验教训,更好地发展符合国情、省情、区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中华民族教育发展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宝库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过去,教育曾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各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对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都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认真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提高全社会对教育的认识,切切实实地促进教育的发展,必将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在未来国际竞争中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促进中华民族的统一;有助于造就一代新人,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更加有力地推动 21 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程。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总课题组

《重庆教育史》序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主任

重庆教育史编纂委员会主任

耿百华

在这乙酉金秋时节，秋风送爽的日子里，《重庆教育史》问世了。这是重庆教育界的一件盛事，它是重庆有史以来第一部教育专史。它把从巴子国至 2000 年，重庆直辖市范围内基本的教育史实、教育思想重现在全市人民面前，让广大教育工作者，温故知新，借鉴历史，以推动当前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

《重庆教育史》体系完整，脉络清晰，重点突出。从巴国发轫，到两汉隋唐，宋元明清直至近代的重庆教育，均有系统的载述，并揭示了其发生发展的规律。至于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教育，更是浓墨重彩，充分展现出战时重庆教育的繁盛蓬勃景象。新中国成立后的重庆教育，在曲折中发展，在探索中前进。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共重庆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重庆实施“科教兴渝”战略，不断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发展迅速，成效显著，进入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重庆教育史》资料翔实。它主要取材于重庆教育志办公室组织搜集的大批资料和重庆市所属 40 余个区县的区县志和区县教育志。对各区县从古到今的教育活动、教育制度、教学情况都有反映。该书撰写了古代各区县官学、私学、书院、科举和教育人物；对近现代西方新教育的传入，重庆各区县新式学堂的建立，各级各类教育的肇始，各种教育思潮的涌现，各种教育实验的开展，各级教师对教育的奉献均有述评；对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重庆教育在党的领导下,在不断探索发展中取得的辉煌成就有更多翔实生动的记载。在史料方面多有新的发掘。

《重庆教育史》总结了历史上的教育经验,有益于当今各级各类教育工作者学习和借鉴。在宋代有张载到合川、程颐到涪陵办书院的经验,在清末有张森楷在合川办实业教育的经验,在民国前期有吴芳吉办江津中学的经验,有张伯苓办重庆南开中学的经验,有陶行知办育才学校的经验,有周勛成办巴蜀学校的经验,有杨若愚办树人学校的经验,有傅仁敢办清华中学的经验,有晏阳初办华西教育实验区的经验,有卢作孚办民众教育的经验等等。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区县各级各类学校都积累了很多办学经验。

毛泽东同志曾十分精辟地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重庆教育史》对重庆3 000年的教育历史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和生动的描绘。

希望全市各级教委(局),应认真组织广大教育行政干部、广大教师、大专院校的学生学习《重庆教育史》,这必将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和帮助。

2005年9月

《重庆教育史》导言

《重庆教育史》记述了重庆 1997 年直辖后,直辖市范围内 40 余个区县从远古到公元 2000 年,在各朝各代、各个历史阶段的教育事实、教育思想,并揭示它的发生发展过程的历史。构建了从古到今的完整教育发展体系,全面、具体地展现了重庆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教育状况及其利弊得失,并揭示了教育的历史本质,分析了历史规律,总结了历史经验,作出了价值的判断。全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地方特色突出,基本做到了有史有论,史论结合。具体言之,有如下特点:

第一,全书的体例采用了断代与专题相结合的形式,较为系统地梳理和恰当地划分了重庆教育发展阶段和情况。全书基本上以朝代为根据分段,但又按照资料的多寡有一个朝代为一阶段者,也有几个朝代为一阶段者。如第一卷第二章,包含了两汉魏晋隋唐几个朝代,第三章至第四章基本上是以一个朝代为一阶段,第五章至第八章把清代分为前中期和清末两个时段,用四章的篇幅记述之。每一章中又按官学、私学、书院、科举、教育人物等专题面具体记述。第二卷亦然。第三卷前四章分段记述,后四章在一个段中分专题论述。在分卷上未按古代、近代、现代来划分,而是按资料的多少,把从原始社会到清代末年的重庆教育定为第一卷,把民国时期的重庆教育定为第二卷,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重庆教育定为第三卷。如此,使三卷能基本平衡,在分量上相差不太远。从重庆教育发展的历程来看,第一卷展示了古代巴族文化与重庆教育的发生和发展,第一卷末和第二卷展示出重庆新教育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第

三卷展示出新中国成立后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学校教育的接收、改造、建设、发展的曲折过程。

第二,全书的内容突出了重点。第一卷,清代的重庆教育比较发达,用了四章的篇幅来进行详述,从文字的分量上看,此四章占全卷的一半以上。第二卷突出了抗战时期的重庆教育,全卷共十一章,抗战阶段的重庆教育占了六章,从文字的分量上看,此六章占全卷的一半多。第三卷突出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庆教育,且按专题将此时段分为四章进行撰著,从篇幅的分量上看,占全卷的一半还强。

第三,体现了地方特色,做到了从本地区实际出发来安排章节,并突出了本地区对全国教育的贡献。如重庆的原始先民为“巫山人”,后改称巴族,第一卷便从巴文化入手,揭示了重庆文化教育的发生与发展。后来,重庆的居民以汉族为主,还包括土家族和苗族,全书便以大量的篇幅写汉族教育,同时也安排了相应的章节来撰著土家族和苗族的教育。抗战时期衣冠西渡,全国不少教育家来到重庆,大搞教育实验,努力进行教育教学,为重庆教育贡献了力量。第二卷的教育人物中便用专节介绍了黄炎培、张伯苓、傅任敢等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在第八章第二节撰述河南籍教育家邵爽秋的民生教育实验;在第十章第三节,专写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华西实验区的教育实验;在第五章第一节中用一个问题来记述“战区中小学教师的安排——第三服务团”。另外,抗战期间,战区流亡学生纷至沓来,为了反映国民政府对战区流亡学生的安排,在第五章第一节里还专题撰写了“收容战区学生”。更重要的是,抗战期间战区各级学校迁渝,使重庆的各级学校教育发展到极盛,真可谓“学校如林,庠序盈门”,使重庆成为战时中国教育的中心。战区学校的迁渝,使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新思想、丰厚的人文精神充盈到这块土地上,同时,这块沃土“又为战后教育与文化的复兴保存了民族的命脉”。特别是迁渝的好些高等学校,来时规模较小,

复原时规模扩大了若干倍,浩浩荡荡地迁回战前原址,第二卷用了不少笔墨来撰写之。新中国建立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重庆武斗特别严重,破坏性很大,给教育带来了严重恶果,第三卷第三章试图反映这一基本情况。1987年至1997年,四川省陶行知研究会在合川开展“生活教育”整体改革实验,历时10年之久。为反映这一实验情况及其效果,第三卷第八章第六节专题撰写了“合川陶行知创造教育实验”。总之,这部书基本上反映出重庆教育历史的地方特色。

第四,该书对重庆历史上的教育资料有不少发掘,这是对重庆教育乃至对中国教育做出的贡献。从第一卷的前半部分不难看出,作者翻阅了大量的上古时期的有关历史资料,参考了三峡考古的新发现,基本弄清了重庆人的来龙去脉和巴文化的发生与发展,为重庆古代教育理出了一个基本线索,同时,有新的发现。第一卷后半段的清代重庆教育资料特别多,是因作者查阅了清代重庆40余区县县的县志,才使清代重庆的教育内容较详细地得以展现。第二卷和第三卷扩充了原四川省的万县地区、涪陵地区和黔江地区的相关内容。把各区县县志和教育志中发掘的新资料都纳入了这两卷的内容。在这两卷中,重庆市各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的革命活动、教育改革都得到了展示,教育、教学经验得到了总结,这显然是查阅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校史,从中发掘了不少资料。在教育人物方面,第一、二、三卷都有新的发现,如荣庆是重庆出生的教育人物,白屋诗人、教育家吴芳吉,真正的师表——唐以荣等,并使这些新发掘的教育人物的教育思想得到了较为完整和系统的整理。

第五,该书注意了史论结合,不但叙述历史,而且也有评论,在评论中有抑有扬。第一卷对每一时期的教育状况和教育人物都进行了概括提高,某些章节还进行了专题评论。第二卷对每一章的教育事实,都专门安排了对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探索一节,一方面概括提高,另一方面进行简要的评说。第三卷各章都安排一节

评析当时教育发展中的成绩和问题,并对成绩加以颂扬,对问题提出对策,基本上做到了抑扬结合。

第六,该书在撰写过程中注意了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国史和地方史的关系,该书总是以中国教育史为纲,统帅重庆教育史;从中央和地方的角度看,重庆市一般都贯彻执行中央政府的方针政策和统一规定。但也有不完全按中央政府统一规定办理的,如北碚三峡实验区的卢作孚。他在区内中小学实行的有独到之处的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举措,有其特别之处。二是重庆市和四川省的关系,现在重庆所管辖的范围,原是四川省在川东的三区(或四区)一市,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抗战时期重庆市区除外)和重庆直辖之前都属四川省政府管辖,因此,在教育方面除贯彻中央政府的教育方针政策外,还要贯彻四川省政府的批示和决定,表明是四川省的一个部分。

第七,该书在研究方法上注意了用对比的手法,即把重庆地区和全国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相对比;把重庆市和成都市相对比;把重庆市各区县和四川省各区县相对比;把重庆市范围内各区县相对比。并在对比中加以量化和分析,得出重庆市在全国、在西南、在四川的政治、经济地位和文化教育地位,以及其在各个时期的地位变化。

从以上特点可知,《重庆教育史》是一部教育的历史书籍。中国近代教育家杨贤江说:“教育史便是以叙述教育事实及思想(即所谓实际及理论)之变迁发达为目的者。故凡称为详尽的教育史书,必要对于教育事实之变迁发达分为教育的事实、教育者的活动与教育制度、法规等,详为记载,再要对于教育的思想学说即所谓理论者,广为记录,或更加以评论。”《重庆教育史》正是这样地记载了重庆各个历史阶段的教育事实(实际)、教育思想(理论)及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并对各阶段的教育事实和思想进行评论分析,以达到总结各个历史阶段的教育经验,揭示其发展规律的目

的。要求笔者在撰写过程中做到有论有史,史论结合。正因为如此,它和教育志书不同。志者记也,文字记录之意。志书,为记录的书籍。所以,《重庆教育志》虽然中正地记录了重庆各个历史阶段的教育事实、教育人物的活动,但不加评论分析,在写作过程中采用记述文体。这就是《重庆教育史》和《重庆教育志》的区别,也就是为什么有了《重庆教育志》还要写《重庆教育史》的原因。

西南大学教育学院、育才学院 李定开
2005年8月